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3.02.005

一脉相承的艺术观念： 从《颜氏家训》到《郑板桥家书》

卢政

(鲁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39)

摘要:《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这两部家训作品虽然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们在艺术观念上却存在诸多相同之处,都具有明显的儒家艺术美学的特征。二者在艺术的功能、艺术的特征、艺术创作原则、审美风格、艺术鉴赏方法、少儿艺术教育等问题上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思想要义却是一致的,都认为艺术具有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的重要作用,重视艺术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反对浮艳浅露的审美风格,提倡入乎其内、全面客观的艺术鉴赏方法,将艺术学习视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等等,体现了二者在艺术观念上的一脉相承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积淀性。

关键词:颜氏家训;郑板桥家书;艺术观念;一脉相承性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3)02-0031-07

《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是我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家训作品,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颜氏家训》成书于隋文帝杨坚灭陈国以后,作者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531—约597),共7卷20篇,内容丰富,体系宏大,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家教范本,广为流布,经久不衰;《郑板桥家书》成书于清乾隆年间,是清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郑燮(1693—1765)写给家人的50余封家书的辑录,书信内容循循善诱,言真意切,见解独到。以上两部家训作品不但反映了作者在修身养性、为人处世、持家治业等方面的思想见解,也生动而真实地体现了他们所持的艺术观念。作为“古今家训之祖”^①的《颜氏家训》“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1]1010},对后世历代家训著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必然对清代家训著作的代表《郑板桥家书》产生深刻的影响作用。虽然这两部家训作品前后相距1000多年,它们在艺术理念上却存在诸多相同之处,具有明显的前后延续性。

一、艺术具有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的作用

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文学艺术具有立德齐家、塑造人格的重要作用。如商代学校教授“四艺”(礼、乐、射、御),周代学校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乐”,可以说是综合的艺术教育,说明那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注意到了艺术对于提升个人道德素养、塑造完美人格的重要作用,进而逐渐形成了注重通过文学艺术促进个体发展的良好教育传统。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艺术功能理论。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引发人的情感和想象、观风俗之盛衰和考政治之得失、增进人们之间的交流和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怨刺上政和表达民情的功能与作用,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然万物。成书于汉代的儒家经典《乐记》则进一步将艺术作为维护社会伦理道德和统治秩序的有效工具。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颜氏家训》《郑板桥家书》继承了诗教、乐教传统,都极为重视文学艺术

收稿日期:2022-11-21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生态思维影响下的中华美学精神生成与嬗变研究”(22BZJWJ01)

作者简介:卢政(1971—),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鲁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评价《颜氏家训》曰:“古今家训以此为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5页)

术的社会功能与美育作用,并且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颜氏家训》认为,文艺具有塑造理想人格的功能作用。颜之推将培养“士君子”作为家庭(家族)教育的主要目的,他说:“君子当守道崇德”^{[2]152},并一再训勉子孙应努力培育诚孝友爱、敦厚中庸、文质彬彬的人格之美。《颜氏家训》对老庄“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的人格之美赞赏有加^{[2]88},教育后辈要摆脱现实功名利禄的束缚,在平淡中实现人生的超越,进而获得彻底的心灵自由和精神解放。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用了非常多的篇幅论述了塑造完美的“士君子”人格的意义,认为“士君子”人格是理想的人格、完美的人格,它“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2]144}。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颜之推进一步思考了文学艺术对于立德齐家、塑造“士君子”人格的重要作用。《颜氏家训·文章》将文章(文学艺术)的功能和作用总结为“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诛,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2]111}

也就是说,塑造良好的人格品质进而维护国家的统治与社会的和谐是文章(文学艺术)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之一。《颜氏家训》反复强调在家庭(家族)教育中,应通过对文学、书法、音乐等的学习加强对子孙后辈的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颜氏家训》只是将文艺看做手段,培养子孙完善的人格、良好的气质和儒雅的气度才是真正目的,因此它并不要求子孙能够精通各种文艺形式,“真草书迹,微须留意”^{[2]244}。《颜氏家训》“文章”篇集中论述了文学艺术的“陶冶性灵,从容讽谏”^{[2]111}的功能和作用,并且指出:“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2]112}。《颜氏家训》专设“杂艺”一篇,将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和射箭、投壶、棋术等游艺统称为“杂艺”。“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2]246},若要立德齐家、成为一个有用之才必须接受书法训练,具备一定的书法艺术素养。颜之推赞同《礼记》“君子无故不彻琴瑟”的说法,认为

音乐雅致有深味,有助于君子的治心修身,可以畅神娱情,《颜氏家训》曰:琴瑟“愔愔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虽变于古,犹足以畅神情也”^{[2]253},“古来名士,多所爱好”^{[2]253}。《颜氏家训》甚至认为如果家世良好的子弟不具有良好的音乐素养,在人格品质上就不是完善的,“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阙”^{[2]253}。还讲道:“画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2]248},主张儿孙们要好好学习绘画。这说明,颜之推已经比较充分地意识到了文艺所具有的独特的德育功能和审美作用。当然,关于不同的艺术门类,《颜氏家训》认为其功能作用是有高低之分的,“文学最受重视,其政治功能、审美功能与实用功能被阐释最多,音乐、书法、绘画被一起归为‘杂艺’篇,更多强调其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而且不厌其烦地教导子孙勿对它们浸淫过深,以免自取其辱”^[3]。

受《颜氏家训》的影响,隋唐以后的家训著作都十分重视通过诗文创作、读书治学、练习书画的方式不断提升子孙后代的人格素养。1000多年后的《郑板桥家书》反复强调不能为物欲所累,要保持人格独立以超然物外。郑燮志在“立功天地,字养生民”^{[4]4708},因此非常注重家人子弟独立人格的培养。他在家书中告诫弟弟不要不加分析地一味学别人连阡越陌地占有田地,要懂得节制和知足,拥有自己份内的田地就够了,并且说:“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俗偷则不同为恶”^{[5]319},就是要求家人亲属要保持独立高尚的人格。《郑板桥家书》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立德齐家、塑造理想人格方面的重要作用,“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4]4708}。雅事,就是强调写字作画在陶冶情感、净化心灵方面的作用;俗事,就是强调写字作画要充分反映现实人生和百姓疾苦。郑燮认为,《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杜甫诗歌、韩愈文章都是学习的范本,这些文艺作品都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真情实感。郑燮劝勉堂弟郑墨要认真学习 and 借鉴王羲之、虞世南、董思白、韩慕庐等前人的文章书法,不断提升个人的人格品质,“吾弟为文,须想春江之妙境,挹先辈之美词,令人悦心娱目”^{[5]313}。《郑板桥家书》中的这种文艺观念对于引导人们通过文艺创作不断提升精神品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很有指导意义的。

可见,不论是《颜氏家训》还是《郑板桥家书》,都明确了文艺审美活动在家庭(家族)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的方式去教育世家子弟,以培育他们良好的人格素养。

二、文艺具有潜移默化的感染力

众所周知,文学艺术具有形象性、直觉性、非强制性、感染力强等特征,它通过美的形象熏渍陶染人,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陶冶人的情操、净化人的心灵。《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都注意到了文艺的这个突出特点,并深入阐述了文艺在影响人、教育人、感染人方面的潜移默化性。

先秦时期,儒家美学逐渐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而又影响深远的诗教、乐教传统,充分意识到了艺术潜移默化地感染人、塑造人的特点。众所周知,颜之推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秩序混乱的时期,他一生坎坷,经历多次重大人生变故,思想一直徘徊于儒道佛之间,但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在颜之推看来,诗书琴画等文学艺术具有强烈的熏染力,而且这种感染力具有一定的潜移默化性。因此他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文学兴趣、艺术素养的培养以及创作才能的训练。《颜氏家训》始终坚持儒家的“诗教”立场,认为“凡诗人之作,刺箴美颂”^{[2]130}。《颜氏家训》认为,潜移默化的陶冶和熏陶有利于完美的人格塑造,所以一再强调家庭(家族)教育要坚持通过文学艺术、良好环境、美言美行等“熏渍陶染”子孙后辈,而“无教而有爱”(即溺爱)、“重于呵怒”都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在《颜氏家训》“慕贤”篇中,颜之推还用墨翟的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①来形容环境对人的影响,以此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经过长期的美的环境和文学艺术的“熏渍陶染”,方能取得良好的家庭(家族)教育效果。《颜氏家训·慕贤》曰:“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2]64}由此我们可以推知:颜之推之所以在《颜氏家训》中将文学艺术作为培养世家子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充分认识到了文学艺术对人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颜之推对文学艺术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文学艺术可以培养人的才干、陶冶情操,但他又说:“文章之体……使人衿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2]112}。颜之推认为文学艺术能触发人的性灵、激发人的情感,往往使人把持不住自己

而率性而为,甚至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许多文人因此落下悲惨的下场,这既说明了个人在乱世强权面前的渺小和无助,也反映了他对儿孙后辈深厚的舐犊之情。但这也恰恰说明,颜之推已经深刻地洞见到了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对人的生存、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郑板桥家书》也充分意识到了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感染力。众所周知,古人关于文学艺术概念的理解与今天完全不同,经历了一个由“杂文艺”逐渐向“纯文艺”转变的漫长历史过程。先秦时期文学兼有文章、博学之义,两汉时期人们逐渐将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主要以是否具有审美性和情感性作为文学艺术的判断标准。《郑板桥家书》中曾经用秦始皇、孔子焚书的历史事件形象而含蓄地阐述了文学艺术所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及其潜移默化的特点:

秦始皇烧书,孔子亦烧书。删书断自唐、虞,则唐、虞以前,孔子得而烧之矣。《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身尊道隆,为天下后世法。^{[5]310}

在郑燮看来,虽然秦始皇、孔子二人烧书的初衷和目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清醒地意识到了文章书籍(文学艺术)对百姓所具有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强烈的感染力,所以他们都把那些自认为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的文章和书籍统统烧掉了。

三、坚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艺创作理念。儒家美学的创立者孔子主张文艺创作应该坚持“尽善尽美”的基本原则,强调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既重视创作的思想性,也不忽略作品的艺术性。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文艺创作理念,提倡“德艺周厚”的文艺观,认为内容与形式“并须两存,不可偏弃”^{[2]123}。《颜氏

^①《墨子·所染》:“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家训·名实》曰：“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2]137}，也就是说内容与形式是有机统一的关系，就像形与影一样，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颜氏家训》强调文艺创作应坚持善与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理致、气调和事义的有机统一，“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2]122}。在颜之推看来，理致、气调是根本，如同文艺作品的“心肾”“筋骨”；而事义、华丽如同文艺作品的“皮肤”“冠冕”，亦不可或缺。这就明确指出了文学艺术创作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突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性、抒情性、义理性的特征，从而将文学艺术与家庭(家族)德育从内在特性上统一起来。《颜氏家训》还强调，好的文章要“典正”“无郑、卫之音”^{[2]123}，在体度风格上要有“宏才逸气”^{[2]123}，这是其情理义有机统一的文艺创作原则的又一反映。

《郑板桥家书》继承了《颜氏家训》的情理义有机统一的文艺观念，强调应把文章的外在形式与思想内容结合起来，认为文章要“敷陈帝王之事业，歌咏百姓之勤苦”^{[4]4708}，反对忽视文章的思想深度而片面强调外在形式的做法。为此，《郑板桥家书》提出了“作诗非难，命题为难”的命题：“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4]4703}“作诗非难，命题为难”的观点一方面要求作诗立意要高、主题明确，另一方面是要求内容与形式要高度统一起来。《郑板桥家书》曰：“‘六经’之文，至矣尽矣，而又有至之至者：浑沦磅礴，阔大精微，却是日常家用……”^{[5]311}在郑燮看来，“六经”中的文章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是那种天体覆盖、大地无垠、浑厚质朴却精细微妙的美却更胜一筹。也就是说，郑燮非常看重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而且更重内容题材，强调文学艺术要真实反映百姓家常日用和社会现实生活。《郑板桥家书》还形象地指出“毋丑其貌而不鉴其深”^{[4]4707}，对于当时的人们鄙薄时文而几乎欲将时文排除在文学之外的做法进行了批评。郑燮认为这种错误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作品的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性，他说：“其他歌诗词赋，扯东补西，拖张拽李，皆拾古人之唾余，不能贯串，以无真气故也”^{[4]4707}。《郑板桥家书》还批评了王维、赵孟頫

的创作，理由是因为他们的诗文不关心“民间痛痒”^{[4]4708}，没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没有达到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他们有的只有“门馆才情，游客伎俩”^{[4]4708}。对当时那些所谓写字作画的名士，《郑板桥家书》也因同样的原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此外，《郑板桥家书》还以同样的标准评判了徐渭《四声猿》和汤显祖《牡丹亭》的优劣。凡此种种，都体现了《郑板桥家书》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创作原则的坚守。

可见，《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在文艺创作原则上，它们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都坚持情义理的有机统一、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四、反对浮艳浅露的审美风格

魏晋时期文人士子进行创作时自觉追新求变、翻陈出新，崇尚慷慨悲壮、明朗刚健、骨力遒劲的艺术风格，文学艺术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魏晋时代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的自觉的时代、文的创新的时代。但到了南朝齐梁时代，由于文士们竞相模仿，一味讲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声律和谐，文风日趋奢靡艳丽、虚华浮浅。对于当时的这种审美时尚，颜之推是持鲜明的否定态度的。《颜氏家训》强调文艺作品要有创新性，主张为文须雅正、“不从流俗”^{[2]123}，不为时流左右，提倡深沉朴实的文风。《颜氏家训》对当时盛行的浮艳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2]122}在颜之推看来，今世的文艺作品过于浮艳浅露，或用事繁复，或肆意放逸，或行文放荡，或穿凿拘泥……颜之推还以自己先父“典正”的文章风格来否定当时的浮艳华丽的文风，他说：“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2]123}所谓“典正”就是“内容上不猎奇，不涉邪，不欺世，不谀人；形式上不粉饰，不卖弄，不矫情，不做作”^[6]。《颜氏家训》还指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2]124}，强调文艺作品应该通俗易懂，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针对当时流行的浮艳文风的委婉批评。

与《颜氏家训》一样，《郑板桥家书》对浮艳浅露的艺术风格也是持否定态度的。《郑板桥家书》认为当时一些文人虽然远不及王维、孟浩然、司空图，但却一味追求“言外之意”“意外之旨”的

审美风格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郑板桥家书》所崇尚的是“沉着痛快”的文风,认为“文章以沉着痛快为最”^{[4]4708},主张将“沉着痛快”作为文艺创作追求的审美风格。郑燮认为,文艺创作应该遒劲深厚、酣畅淋漓,敢于直面现实,《左传》《史记》《庄子》《离骚》以及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是这种审美风格的代表和典范。虽然这些诗文作品“间有一二不尽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者,是他一枝一节好处”^{[4]4708},但这并非它们的本色,其本色是沉着痛快。《郑板桥家书》还对方百川和侯方域的文章进行了比较,认为方百川“时文精粹湛深,抽心苗,发奥旨,绘物态,状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浅近”,而侯方域的古文虽然“标新领异,指画目前,绝不受古人羁縻”,但“语不遒,气不深,终让百川一席”^{[4]4707}。由此可以看出郑燮对“沉着痛快”文艺审美风格的赞赏与追求。当然,郑板桥对其他审美风格并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根据具体文体进行具体分析,例如他认为司空图主张的“意外之意”“言外之言”对一些绝句、小令等体裁则是适用的,“若绝句诗、小令词,则必以意外言外取胜矣”^{[4]4708}。

五、文艺鉴赏应入乎其内、全面客观

《颜氏家训》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庭(家族)教育的典范教材,但它并非局限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范畴,还广泛涉及文艺批评与欣赏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清代四库馆将其纳入子部,而非经部。《颜氏家训》主张文艺鉴赏要深入文本,细致品味作品的深意;要全面客观,既看作品的道德教化功能,也看作品的愉情悦志功能。《颜氏家训·文章》曰: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鸛鸣》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扬雄安敢忽之也?^{[2]119}

《颜氏家训》之所以批评扬雄轻视诗赋的观点,是因为他忽略了文艺作品“陶冶性灵”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颜之推的观念里,文艺鉴赏要全面客观,不能执于一端。而且《颜氏家训》还强

调:进行文艺作品鉴赏时,应“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2]111}。细读作品文本,深入体会其中的滋味,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一个文艺鉴赏者,如果行有余力,就应该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颜氏家训》对诸多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可以看出,它认为文艺鉴赏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复杂过程,鉴赏者通过对作品形象和意象的感知去深入把握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情感,进而获得审美愉悦。《颜氏家训·文章》还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

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2]121}

颜之推通过这段话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文学艺术“既有寒木,又发春华”,绝非单纯辞藻的玩弄。对于文艺作品而言,“寒木”是指深刻的主题思想,“春华”是指愉悦身心的文采,在进行文艺鉴赏时要秉持一种客观全面的态度,“寒木”“春华”二者皆不可偏废。

在文艺鉴赏方面,《郑板桥家书》反对“以过目成诵为能”的错误认识,提出了“寻求贯穿”“自出眼孔”等具体方法,体现了《郑板桥家书》的文艺鉴赏观念,即在进行文艺鉴赏时要深入细致地阅读和理解作品,评价要全面客观,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郑板桥家书·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曰:

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千古过目成诵,孰有如孔子者乎?读《易》至韦编三绝,不知翻阅过几千百遍来,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虽生知安行之圣,不废因勉下学之功也。东坡读书不用两遍,然其在翰林读《阿房宫赋》至四鼓,老吏苦之,坡洒然不倦。岂以一过即记,遂了其事乎?惟虞世南、张睢阳、张方平,平生书不再读,迨无佳文。且过辄成诵,又有无所不诵之陋。……^{[4]4704}

郑燮对“以过目成诵为能”的做法进行反思了,认为“最是不济事”。在他看来,“过目成诵”的弊病

在于“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必然导致走马观花、囫圇吞枣的鉴赏效果,不能真正体味文艺作品的美感。他以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千百遍,苏轼读杜牧《阿房宫赋》至四鼓却洒然不倦的例子来说明:鉴赏文学艺术作品不能匆匆而过,要深入其中,反复品味,细细斟酌,尤其是对于那些精美的篇章。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要旨、体会其中的美感呢?郑燮主张全面客观、深入细读,为此他提出了“寻求贯穿”“自出眼孔”的文艺鉴赏方法。《郑板桥家书·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指出:读书“当刻刻寻讨贯穿,一刻离不得”^{[4]4699},强调读书要全面通读,应避免孤立地片面地理解作品。进一步讲,在进行文艺鉴赏时,不要孤立地欣赏某一作品,而要结合整个历史文化背景去理解和把握作品。郑燮在家书中还写道:“竖儒之言,必不可听。学者自出眼孔、自竖脊处读书可尔。”^{[4]4701-4702}强调读书要有独特的眼光,要独立思考、客观地做出评论,不能人云亦云、盲从他人观点。那么如何才能有独特的眼光呢?郑燮要求鉴赏者必须有至情至理,离开了至情至理也就不会获得独特的见解。郑燮的这种文艺鉴赏观明显受到明清时期“重情”的美学思潮的深刻影响。

六、文艺学习是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重视少儿教育的优良传统。在许多中国古代家训作品中,都有少儿教育的内容。《颜氏家训》和《郑板桥家书》则明确将学习诗文书法等艺术作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

《颜氏家训》积极提倡早教,主张世家子弟从少儿阶段就开始接受文学教育,学习《诗经》《论语》等文学经典: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2]71}

中国古代有小学、大学之分。在先秦时期,贵族子弟一般八岁时入小学,以文字训诂、礼乐知识为主要学习内容;十五岁时入大学,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但《颜氏家训》认为八岁开始教育已经晚了,对孩子的教育应该在八岁之前就开始进行,“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

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2]82}。《颜氏家训》曰:“生子咳嗔,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2]15}强调应该在孩子刚刚懂得看别人的脸色、辨别别人的表情的时候,就开始对其进行教育。更难能可贵的是《颜氏家训》还明确倡导“胎教”,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受孕妇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欣赏美好的事物、聆听美妙的音乐。《颜氏家训》还详细介绍了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2]15}众所周知,人们对于胎儿很难通过一般的德育、智育和体育的方式施以教育,胎教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艺术教育,所以《颜氏家训》提倡胎教,其实就是提倡早期的艺术教育。《颜氏家训》认为,“人在少年,神情未定”^{[2]64},可以通过艺术熏陶促进少儿良好个性习惯的养成和完美人格的构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后世子孙从小就要接受音乐教育、绘画教育和书法艺术,认为音乐、绘画、书法与文学一样,都是士大夫子弟必备的才艺。《颜氏家训》不但将文学艺术学习作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还特别指出少儿艺术教育的方式要因人而异,不能千篇一律。《颜氏家训》曰:“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2]10}由于先天后天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孩子之间在聪愚、丑俊或乖巧顽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实施艺术教育时既要注意因材施教,又要一视同仁。

郑燮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有很多内容是关于少儿教育的,并且将文艺学习视为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郑板桥家书·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曰:“余五十二岁始得一子,岂有不爱之理?然爱之必以其道,虽嬉戏玩耍,务令忠厚悱恻,毋为刻急也。……要须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4]4704-4705}如何培养孩子的忠厚之情呢?郑燮认为,必须教育和引导孩子多读诗书。在郑燮看来,文艺学习是培养孩子良好性情和真实才干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少儿教育的重要内容。他在写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次强调要让孩子多读书、多学习诗文和书法。而且郑燮在生活中还积极践行了这种少儿文艺教育观念。郑燮虽然是老来得子,但从从不溺爱儿子,儿子五岁时就开始教儿子读书写字,如果字练不好就会受到打手心的惩罚。郑燮在山东做官时,不断写诗寄回家中让儿子诵读和学习。《郑板桥家书·潍县寄舍弟墨第三

书》写道:“又有五言绝句四首,小儿顺口好读,令吾儿且读且唱,月下坐门槛上,唱与二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4]4707} 郑燮的儿子也正是在长辈的教育引导下,反复背诵这些诗句,明白了许多人生的哲理,并逐渐成长起来。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颜氏家训》深受传统儒家美学思想的影响,如《颜氏家训·文章》开篇就提出了“夫文章者,原出《五经》”^{[2]111},这是典型的儒家文章“宗经”观念;再如,书中多次出现“圣贤之书”“《礼》云”“孔子曰”等字眼。《颜氏家训》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诗教、乐教传统,强调文艺在立德齐家、塑造君子人格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注重文学、音乐、绘画、书法等各门类艺术引发兴味、陶冶性灵的功能,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艺观念的深化与发展。《郑板桥家书》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基本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文艺思想,深化和拓展了对许多具体文艺问题的思考,而且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总之,《颜氏家训》与《郑板桥家书》都具有明显的儒家文艺美学的特征,二者在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特征、文艺创作原则、审美风格、文艺

鉴赏方法、少儿艺术教育等问题上的表述虽不尽相同,但核心思想却是一致的,体现了文艺观念的一脉相承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历史延续性和积淀性。今天,我们面临着如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理论这一重大历史任务,需要研究者们积极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从《颜氏家训》《郑板桥家书》等古代经典中汲取文艺美学思想营养。

参考文献:

- [1]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2] 庄辉明,章义和. 颜氏家训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3] 王伟. 《颜氏家训》中的文艺批评观[J]. 齐鲁艺苑(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20(6).
- [4] 楼含松. 中国历代家训集成[M].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
- [5] 郑宏峰. 中华家训[M]. 北京:线装书局,2008.
- [6] 韩府. 颜之推文章学理论探要[J]. 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cept of Same Origin: From Yan's Family Precepts to Zheng Banqiao's Letters Home

LU Z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udong University, Yantai 264039,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y are more than 1000 years apart, *Yan's Family Precepts and Zheng Banqiao's Letters Home* hav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cept, being typical of obvious Confucian aesthetic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y hav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n the literature and art's function, feature, creative principle, aesthetic style, appreciative method, and children's art education, but their essential idea is consistent. They think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morality, managing family and shaping a gentleman's personality.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subtle influe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dhere to the creative principle of organic unity of content and form, oppose the flashy and superficial aesthetic style, advocate deep,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appreciation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regar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so on, which reflects the same origi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oncept, and the historical inheritance and accumulation of Chinese aesthetic spirit from one side.

Key words: Yan's family precepts; Zheng Banqiao's letters home; concept of literature and art; same origin

(责任编辑 雪 箫)